

論大陸漢語人文研究興起的歷史背景

蘇新春

廣州師範學院

漢語人文性研究指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在大陸出現並日益流行的一種探求漢語文化特徵的語言學新流派。這種研究主要由中青年語言研究者進行着。他們原來都受過良好的結構主義語言學訓練，現在則對把語言看作脫離於人這個主體的，純靜態、抽象、所有語言之間存在着共同規律的符號系統表示深深的懷疑，在各自的研究中不約而同地提出了新的學術主張——建立中國文化語言學。陳建民先生一九八五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開設「文化語言學」課程。早期的代表論著有游汝杰、周振鶴二位先生的《方言與中國文化》（1985）、申小龍先生的《中國語言學的宏富之路——文化語言學》（1986）。「中國文化語言學」的提出引起了學術界的注目，在多次全國性的學術會議上成爲既定或自發的討論中心。多家刊物還設立專欄討論。首屆全國語言與文化研討會於一九八九年夏在大連召開。首次冠以專名的著作《中國文化語言學》（申小龍著，1990.9）、《文化語言學》（邢福義主編，1990.10）幾乎同時出版。第二屆全國語言與文化研討會也將於一九九一年底在廣州召開。

漢語人文研究的思潮在短短幾年中，蔓延到中國語言學的衆多領域，湧現出了衆多成果，成爲各種類型學術活動中的熱門話題，這決不是某些好事者的想入非非，而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必然性的：

一、對中國現代語言學純形式研究的強烈反思。

中國現代語言學以《馬氏文通》爲肇始，經歷了近百年的發展，致力於漢語結構的形式描寫。晚近的四十年中，最發達的學科是語法學、方言學，都取得了公認的成就。進入八十年代，正當這些學科長足進步、躊躇滿志的時候，中國語言學卻遭到前所未有的、來自多方面的批評。一九八五年《光明日報》發表短評，批評現在的語言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帶有封閉式的特點：靜態的語言事實研究得多，動態的語言現象考察得少；定性的描述多，定量的分析少；縱向的分析性的研究多，橫向的綜合性的探討少；長於微觀的觀察分析，失之於宏觀的多維視野。封閉式研究的局限性和語言文字研究的綜合性不能相互適應，這給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都帶來了困難。」^①儘管這是從加強語言信息功能和使語言研究手段現代化的角度來說的，但對語言研究現狀的批評卻是一針見血。主張從動態和多角度研究語言的學者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批評：「由於語言是一種極爲複雜而又特殊的社會現象，人們所處的世界是一個需要語言來溝通聯繫並被語言所描繪的世界，因此，語言研究就不能僅限於語言內部結構的一個角度，一條路子。」^②「我國的語法研究在方法的嚴謹、描寫的準確、結論的可靠等方面取得了世所公認的成就，但是當我們致力於這些目標時，卻無意中形成了一種較

為封閉單一的格局和傳統，慣於某些駕輕就熟的方法和理論、某些游刃有餘的現象和領域，以至於失去了理論建樹的熱情、方法探索的勇氣；往往拘泥於事實的鋪陳和細節的推敲，缺乏一種高屋建瓴的理論氣勢，疏忽了語法祇是一種表層現象，要真正理解它還必須深入到它的背後去發現制約着它的認識、交際、文化、社會、心理等因素。」^③

對中國現代語言學批評更具徹底的是文化語言學中的文化認同派。它認為語言有自然和人文的屬性，而本質屬性是人文性，中國現代語言學只在語言的非本質屬性上下功夫是遠遠不夠的。認為「整個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困惑是西方語言流派中科學主義思潮與漢語獨特的人文特徵的深刻對立。」^④以往漢語被僅僅看成是一個單純的符號系統，而忽視了漢語所蘊含的深厚的文化歷史積淀和獨特的文化心理特徵。

在對研究現狀的強烈反思中宣傳人文研究已成為文化語言學興起的一個明顯特徵。也可以說，中國現代語言學發展到了今天，舊的學術範疇的活力已經發揮，弊端正不斷顯現時，它就必然會從內部爆發一場革命，面臨螺旋式上升的再生命運。《上海青年語言學》的創刊辭（1986）就強烈表達了命運交替之際發奮者的心情：「縱觀中國語言學的現狀，對它的發展前景，我們的憂患大於信心。我們再也不能僅僅滿足於前輩學者開闢的道路，僅僅滿足於他們教給我們的一切。我們時刻在對歷史傳統進行反思：人們是怎麼提出問題的？為甚麼要這樣研究？能不能以新的方式去探索？」

二、對漢語研究的新角度切入

強烈反思的提出有着更為重要的內部原因，即文化語言學研究者們都有着扎實的研究實踐。《方言與中國文化》從漢語方言的分佈入手，考察了古代行政地理區劃和古漢民族的移民史，作者因此而獲中國社科院青年語言學家獎。劉煥輝的《言語交際學》（1986）從語言的動態使用入手，探討了言語交際的種種規律，該書被「視為開拓性的學術研究成果。」^⑤陳建民先生也在漢語使用的社會制約因素方面作了大量的實地調查，不斷有新作問世。申小龍先生對先秦典籍《左傳》和當代中篇小說《井》的近三萬個句子作了定量分析，撰成《中國句型文化》（1988），奠定了申氏理論的堅固基礎。近年來對漢語作人文切入的領域更多了，充分顯示出文化語言學的蓬勃生機。

三、大陸「文化熱」的影響

八十年代中國出現學世矚目的文化熱，其論著之多、討論之熱烈、來勢之集中、參與者之廣，都是學術史上鮮見之例。文化熱直接促使了人們對漢語研究的深深思考。「漢語研究的現代化與中國的現代化一樣，要到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去尋找根據，而不是到西方的菩提樹上去摘下一串現成的果子。」^⑥「近幾年興起的傳統文化熱，正好為漢語語言學方法論提供了民族化的文化背景。在這樣的情勢下，把傳統文化研究和漢語研究結合起來的文化語言學就必然產生。」^⑦在文化熱的討論中，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本質、發展演變規律、表現形式的認識，都對漢語人文研究產生了

借鑒、啓迪作用。可以說目前漢語人文研究者所揭示的漢語人文特點，與哲學界文化界人士所揭示的中國傳統文化特點有着內在的高度一致性。如關於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特點，文化學者認為：「正是長期封建社會形成、發展的倫理型的民族文化，造成中國人觀察客觀世界的樸素、籠統的整體觀念，注重直覺體悟的思維方式。特別是由於強調人際關係的和諧一致的文化心態，更使思維方式趨於尋求對立面的統一，忽視在對立面鬥爭中深入揭示其本質規律。」^⑧關於中西語言背後的文化差異、思維方式的差異，文化學者認為：「中西方兩種不同的語言代表了中西方兩種不同的思想傳統、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國語言是形象語言，是空間性的，顯示存在於空間中的事實。……而西方語言是聲音語言，是時間性的，通過時間的延續顯示外在事物。」^⑨這些見解都有力地支持了中國文化語言學的研究人員。

近年來大陸的文化熱明顯降溫了，但在漢語學界，它卻通過人文研究派而繼承發揚下來了。這不是偶然的，正說明語言是民族文化的最好和最本質的表現形式。語言的差異在於文化，語言的研究透徹了，必將為中國的哲學史、思想史、社會史、科技史、文學史、藝術史、宗教史、民族交融史、移民史、歷史地理等衆多人文學科提供具有獨特價值和富於啓示的成果。

四、西方人文語言理論的影響

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對西方語言理論的吸收呈全方位的態勢擺開。一改幾十年來，中國現代語言學主要受結構主義學派影響的格局，西方人文語言理論也日漸為中國語言研究者所了解，如德國的洪堡特，美國的鮑阿斯、薩丕爾、沃爾夫、拉波夫，法國的梅耶，英國的帕默爾、馬林諾夫斯基等人的學說都經常為人們所議論。漢語人文研究的學者都充分肯定他們的理論，如說到洪堡特，他「反復說明漢語是一種充盈着人的主體意識，具有很強的人文性的語言。儘管洪堡特還不可能對漢語所體現的文化精神有更多的了解，但他無疑天才地把握住了漢語與西方形態語言在組織面貌上迥異的精神實質。他的漢語觀在今天仍有強烈的現實意義。」^⑩他的「研究成果對語言科學意味着一場理論變革的開端。」^⑪說到薩丕爾，說他是「繼鮑阿斯之後，第一個系統闡述人類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的語言學家，他把受行爲主義思想洗禮而日漸僵化的描寫語言學，重新置於文化生態環境之中，從而賦予結構主義語言學以新的血液和生命。」^⑫當然，對漢語人文研究持異議的人則可能持完全相反的觀點，如有人就說到：「顯然，從洪堡特到薩丕爾、沃爾夫在對待語言與文化、思維的關係上表現出十足的唯心史觀。」^⑬應該承認，西方人文語言理論以前並未受到中國學者應有的注意和評價。隨着研究的深入，對他們的理論或繼承，或修正，或完善，都不必以為奇怪。對他們的學說就是西方學者也有一個認識過程，如對沃爾夫，英國學者在晚近時候就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我認為他的這些看法會成為二十世紀語言學的主要貢獻之一。」^⑭

中國文化語言學的研究者公開聲明自己的主張借鑒了西方人文語言學的理論，如首部概論性著作《中國文化語言學》的作者就宣稱：本書「將中國傳統對世界、人、

特稿

語言三者關係的本體論認識同現代人類學語言學的語言相對論，歐洲人文主義的語言世界觀，當代釋義學關於語言的人性與人的語言性的深遠思想有機結合起來，闡釋了一種全新的人文主義語言觀。」^⑬

漢語人文研究派有自己明確的目標追求。既然它的出現是學術發展的必然，假以時日，相信必定會開花結果。

注釋：

- ① 劉連元《開拓思維空間，強化研究手段》，刊《光明日報》1985年7月9日。
- ② 劉煥輝《言語交際學》，刊《百科知識》1989年第1期。
- ③ 劉大為、邵敬敏《九十年代語法研究的新思路》，刊《文匯報》1990年8月22日。
- ④ 申小龍《歷史性的反撥：中國文化語言學》，刊《學習與探索》1987年第3期。
- ⑤ 見該書嚴學窘先生的前序。
- ⑥ 申小龍《文化斷層與中國現代語言學之變遷》，刊《復旦學報》1987年第3期。
- ⑦ 沈錫倫《文化語言學：對漢語文化的反思》，刊《光明日報》1988年2月2日。
- ⑧ 陳傳才《中國民族文化的特質與變革》，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
- ⑨ 成中英《中國語言與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刊《理論信息報》，北京：1988年6月20日。
- ⑩ 申小龍《洪堡特語言類型學思想和語言哲學》，刊《銀川師專學報》1989年第1期。
- ⑪ 姚小平《洪堡爾特語言理論評介》，刊《百科知識》1988年第1期。
- ⑫ 申小龍《美洲語言人文主義及其研究範型》，刊《華東師大學報》1989年第2期。
- ⑬ 陳炯《洪堡特的人類語言學與申小龍的文化語言學》，刊《北方論叢》1989年第4期。
- ⑭ (英) M.A.K. Halliday《系統語言學的背景》，刊《國外語言學》1988年第3期。
- ⑮ 見《青年漢語史學刊》總12期，1989年9月。